

爱 与 希 望 的 小 街

周成林 / 著

Street of
Love and Hope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周成林/著

Street of
Love and Hope

爱 与 希 望 的 小 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与希望的小街 / 周成林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5. 7

ISBN 978-7-5411-4110-2

I. ①爱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51072号

AIYUXIWANGDEXIAOJIE

爱与希望的小街

周成林 著

策划组稿 安 然
责任编辑 郭 健
责任校对 汪 平
责任印制 唐 茵
封面绘图 张雅文
封面设计 任 熙
版式设计 史小燕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93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203mm × 140mm 1/32
印 张 7.75
字 数 180 千
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一版
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110-2
定 价 3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自序

写作无需文凭。作家有大有小，但我从没遇到自称专科作家、本科作家或研究生作家的同行，也没碰上不看作品先验文凭的编辑。可惜的是，这个常识在文字以外的世界仍未通行。我当初提笔，一是从小就有的兴趣，二是我没文凭，多数时间找不到像样的工作，三是我也渐渐发现，常人眼中的“像样工作”并不适合自己。文字或语言，是我唯一的“技能”，靠它暂时活着，没有什么难为情，就像鞋匠补鞋，厨师炒菜，裁缝做衣。尽管前途难卜，尽管朝不保夕，尽管至今没有立锥之地，不时还得靠人接济，我还是很高兴做一回自己想做的人，但也时刻提醒自我：作家，尤其独立作家，不必觉得自己与众不同，更不应该自我膨胀。

《爱与希望的小街》，原是我的上一本小书《考工记》的续集。本书完稿后，鉴于这两本书的背景相似，内容连贯，尤其笔下人和事，都跟作者有这样那样牵扯，我决定听从出版社建议，把两书尽可能合而为一，不仅让前些年自己的这类写作告一段落，也给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读本。然而，我愈来愈不喜欢“个人史”“回忆录”这类整齐划一的标签，所以一方

面纪实，一方面也尽量向文学靠拢。除了早期某些文字，我后来写的大多数篇章不再过多评论，而是尽可能忠实再现。我的文字也愈来愈简单；这一简单并非刻意，而是符合这几年（包括今后）我的生存状态。读完本书，读者不难发现，书中人物，不论至亲还是好友，要么早登鬼簿，要么已跟作者相忘于江湖。但我必须说明，写到他们时，作者并无恶意，也不回避自己的愚笨。这也是为什么，我要在本文开头提醒自我：作家不必觉得自己与众不同。

本书书名，灵感得自日本导演大岛渚的早期电影《爱与希望的街》。电影中的穷街陋巷，让我想起早年跟祖母住过的小街。我在这条小街慢慢长大，感受爱与希望，体会恨与绝望。我们的左邻右舍多为无权无势的弱者，我是他们的一员。等到成人，我有机会接近权势和财富，虽然短暂着迷，但我最终还是站回无权无势的弱者一方，我仍是他们的一员，哪怕这条小街名存实亡。本书写到的人物，不论我视为至亲的祖母还是让我爱恨交加的父母，不论管制分子还是知识青年，不论从前同学还是过去同事，不论联防队员还是日式酒吧的妈妈桑，既是常人，又是常人眼中（或他们自己眼中）的失败者或畸零人。每个人都很独特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。我的文学版本未必“权威”。我笔下的自己，也只是我眼中的自己。我笔下的失败者或畸零人，无论在世与否，他们若肯动笔，或许又是别样光景。

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

目录

001 _ 上池北街十九号

008 _ 上学

022 _ 乱云

028 _ 残云

033 _ 晚春

042 _ 我们要爱母亲

049 _ 暖灰

057 _ 杀父

065 _ 附：写给父亲的信；祖父的自述

085 _ 看电影

090 __管制分子高明思

094 __知识青年伍大郎

102 __考工记

132 __少爷

143 __刘气功

154 __同情兄

168 __联防队员周成林

176 __冷冰冰

192 __文凭

203 __床

213 __相亲

223 __Nickel

232 __钱

上池北街十九号

院子里有两棵树。从我和祖母住的堂屋望出去，左边是一棵桑树，右边是一棵葡萄树。桑树有五六米高，从我记事它就有了。很多年，桑树都结黑红桑果，桑叶我摘来养蚕。夏天，树上知了叫得让人心烦。你找来一小团沥青，在蜂窝煤炉上把它烤软，粘在晾衣服的竹竿顶端。粘知了很费神。我很笨，一次也没粘到。葡萄树是院内明家栽的，从我记事它就结果。葡萄熟了，小明叔叔从工厂下了班，拿着一把剪刀，端着一根木凳，在葡萄架下摘着葡萄。收成通常不坏，装满两三个竹筲箕。不算明家，院里四家人都有份。

可是院里没井。提水挑水，要到对街的二十号大杂院，或去上池北街和小巷子交界处的自来水桩；这一带只有这一个水桩。井水不要钱，也比自来水清凉。夏天，祖母用井水冰西瓜和过夜的剩饭剩菜。祖母做的糖渍番茄，只有井水冰过，吃起来才会凉爽。家家都有一个储着自来水的大水缸。做饭，烧开水，我们都用自来水（除非接连几天停水），井水多半用来淘米、淘菜、洗衣服和烧洗澡水。

我上初中，祖母买了一根竹扁担，开始让我去自来水桩挑水（在这之前，我们用的自来水，多是左邻右舍帮着挑的）。小明叔叔的母亲明婆婆管着这个水桩，每天只开一次。椭圆的水泥水桩背面，有扇上了锁的小木门，明婆婆负责放水。黄昏，水桩前很热闹，都是挑水居民。就像后来的收费公厕，水票可以先找明婆婆买好。

院里也没厕所。上池北街只有一个公厕，就在跟文庙前街交界的路口。自来水桩附近的小巷子还有一个，有点远，街那头的居民爱去。公厕很简陋，男厕蹲位只有四五个，也没隔板木门，夏天还有白胖蛆虫爬上厕板。大概我上高中，这个旱厕才改成自动水箱统一冲水，有了低矮的砖砌间隔；夏天热臭，冬天冷臭。早晨，公厕也跟黄昏时候的水桩一样热闹。街坊蹲着解手，抽烟，聊天，读书，看报，发呆。便秘的，咬紧牙关满脸涨红暗暗用劲。忘带厕纸的，就找在场哪位讨几张草纸信纸。还没“登基”的男男女女站在门口等着空位，不时搭话。

如果十万火急，那就在家解决。家家都有马桶，成都话叫作桶子。桶子快满，尤其家里人多，早晨得去公厕倒桶子。每天黄昏，农民拉着粪车进城。城里人把粪车叫作土坦克。土坦克开进上池北街，农民挑着粪桶沿街吆喝：“倒桶子啰！”粪桶挑进院子，我们都把桶子端出来，倒完了，就在院内阴沟边，用马桶刷刷着桶子（春节过后，蒜薹降价，家家都吃蒜薹，家家桶子都有一股怪异的蒜薹味）。农民衔着叶子烟杆，看你倒桶子，跟你寒暄。有时，他顺带送上几把新鲜蔬菜：“自留地种的。”用的也许就是大家的肥料。农忙时节，土坦克好几天不进城。祖母和邻居很担心，街口公厕的粪坑愈来愈满。“倒桶子啰！”听到这声吆

喝，大家松了一口气。

洗澡不是小事，尤其冬天。家家一个大木盆或搪瓷盆，香皂却不是家家都有。我和祖母用了好多年的皂角和本地产的芙蓉牌肥皂。夏天，你可以隔几天就洗一次热水澡，或去对面院子提桶井水，站在阴沟边冲个冷水澡，要么到附近的南河游泳。冬天，成都不像北方城市有暖气，你只能去祠堂街的国营健康浴室泡大池。大池的水通常混浊，水面一层油污。泡完浑水，身上却不痒了。下次再来，也许一个月后，等你又觉得痒。

院内的陈伯伯和周嬢嬢都是工人，有三个女儿，她们洗澡要排轮子，也最让我好奇（我在学校学到几句顺口溜：今天星期三，我们去爬山；今天星期五，你们妈在屋头洗屁股）。陈家有兩间房子（明家隔在中间），他们的厨房跟我们的厨房之间，只有一道抹了泥灰的篱笆墙。祖母到白铁组上班去了。隔壁有动静。我凑近墙缝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正在洗屁股的陈家大姐叫了一声我的名字，我吓得赶紧溜回堂屋。我那时正念小学。

吃也不是小事。油水太少，又长身体，我时常癆肠寡肚。家家早餐，多半开水煮剩饭加泡菜，要么开水泡馒头，放点白糖。白糖凭票供应。祖母把糖罐锁进立柜。有时她忘上锁，我会打开糖罐偷吃两匙。有一阵子，白糖也很紧张，国营副食品商店只有粗糙褐色的古巴砂糖。我们也吃炒面，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吃过的干粮。但是我们比他们幸福，不用一口白雪一口炒面。煮鸡蛋只有生日才有，牛奶更是奢侈。院里只有陈家伍家订了牛奶。有时，伍家的牛奶喝不完，易嬢嬢就端给我喝。凭票供应的水果硬糖和小圆蛋糕，祖母也锁进立柜。只有提糖饼不用凭票，又黑又硬，是我吃过的最难吃的点心。蒜薹炒肉我最爱吃。有

年我过生日，祖母做了蒜薹炒肉。但我那天很不听话，祖母黑起脸，把蒜薹炒肉倒进阴沟边的泔水桶；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她的怪脾气。蒜薹炒肉（或者笋子烧肉），成都话还有一层意思：用竹箴片打屁股。我那天的确也吃了一顿蒜薹炒肉。

我用连环画跟小学同学糖鸡屎（他姓唐）换过几只半个巴掌大的河蟹。糖鸡屎住在上池正街小学旁边，比我会捉河蟹（我捉的都是小蟹）。祖母把河蟹油炸，嚼起来很香。我们也吃油炸蚕蛹。有个同学养了很多蚕，他们吃的都是自家的蚕蛹。如果蚂蚁、蟑螂和老鼠可以吃，我们可能也会照吃不误。初中的时候，我养过一只兔子。有天放学，兔子已在锅里。祖母把它杀了，给我做了红烧兔丁。这只兔子很瘦，几乎都是骨头。

我吃得最畅快的一餐，是隔壁伍家的二爷爷去世，我还在念小学。我跟大人去了火葬场。回到家里，我饿坏了。丧宴有一桌摆在我家厨房。我大概吃了五碗饭。除了过年，我没见过这么多吃的，尤其这么多肉。这是我第一次吃撑，撑得就像连环画的主人公七把叉（他住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，因为能吃，被贪婪的资本家当成赚钱工具，参加饕餮比赛，当场撑死）。大人笑我，说我就像“六一、六二年投胎的”。

我们都烧柴灶和蜂窝煤。用板车拉蜂窝煤的龚胖子四十来岁，就住对面大杂院，但他出了名的好吃懒做，不会把煤送进你家厨房。你得把蜂窝煤用木板垒成两列，或用双手捧着，从院外小心翼翼搬进厨房。有时，蜂窝煤太软太湿，散了不少。过一阵子，小明叔叔、陈伯伯或伍大郎就会借来一套钢制模具，抡起铁铲铁锤，用散掉的煤渣自己做蜂窝煤。冬天，祖母把蜂窝煤炉或者后来买的铁皮炭炉放在堂屋正中，烧开水，烤火，热菜，续竹

编烘笼儿的炭火（烘笼儿可以捧在手上、放在脚下或是老人的围腰下面取暖）。我们住的瓦房到处透风，不用担心煤气中毒。

春节快到，国内形势一片大好，各条战线捷报频传，我们的肉票油票也盼来额外供应，家家都熏腊肉灌香肠。到了除夕，院内桑树边或阶沿上牵了一盏电灯，摆了一副石磨和一只木盆。每家轮流推着汤圆粉，一勺水，一勺用水泡胀的糯米；一边推，一边七嘴八舌。推好的汤圆粉装进大小布袋，湿淋淋挂上晾衣竿或屋檐，仿佛我后来见过的拳击沙包。汤圆粉一直推到午夜。最后一轮结束，灯灭人散。没有鞭炮烟火，没有喜庆电视，除了气管炎陈伯伯几声咳嗽，上池北街十九号静得就像乡下。躺在床上，想着明早的汤圆，我隐隐听到南门大桥的水声，听到火车南站远远飘来的两声汽笛。

每年某个时候，院里要淘阴沟和拣瓦。这是男人的事情。我还不是男人，只能观望。淘阴沟又脏又累，这个差事后来交给收泔水的农民（阴沟旁边有个公用的泔水桶）。拣瓦就是把屋顶漏雨的地方换上新瓦。我和祖母住的堂屋一直没吊竹编天花。下雨刮风，不是这里那里漏雨，就是人字屋顶的灰尘雪片一般落下。拣瓦我们只能靠邻居。别人拣瓦，顺带帮我们换几片。我们住的公房。有一年，房管所来修房子，祖母没像伍家陈家那样，请负责的王师傅好吃好喝。最后，我们的地上没铺三合土，头上也没吊天花。跟伍家相连的厨房用墙隔了起来，那边墙上抹了水泥刷了白灰，我们这边还是粗糙的红砖墙。堂屋的墙，从我记事就是又黄又黑。等我稍大，我很羡慕别人家里有天花有白墙，地上还铺了三合土。

每隔两三个月，或者每月某个时候，骑着绿色二八单车的邮

递员就在院外吆喝祖母的名字：“王静轩，盖章。”远在内蒙的父亲给我寄来生活费（我上初中时，这笔钱中断好几年）。初中以前，除了到院门口收汇款单（祖母不在家时，她把私章放在桌上），去街头上公厕，到国营干杂店打酱油醋，跟着小明叔叔或伍大郎上街，到附近两三个要好的同学家，祖母不准我出院门，更不准我跟街上的大人小孩一起玩。多数时间，我很听话，放了学马上回家，寒暑假也很少出门。即使祖母不在，我也不敢乱走，因为邻居会告诉祖母。跨出上池北街十九号的大门槛，街上小孩子满口粗话（院里只有陈伯伯打老婆和三个女儿的时候才会日妈捣娘）。翻墙爬树，我始终不如他们灵巧，我连游泳也没学会。就像糖鸡屎用河蟹跟我换连环画，他们用萝卜枪和屎壳郎跟你换小人书。我怕他们，又想跟他们玩。

“批林批孔”和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之间，上池北街成立了革命大院。我们的院子太小，只能跟附近几个小院和住在街边的居民一起，归入整条街的革命大院。成立大会就在对面的二十号大杂院内。每个院子的大门油漆一新，贴着革命标语，插着红旗，挂着大红灯笼，悬着五彩纸条。临街住户铺板上的毛主席语录也重新描过。开会那天，对面院子挂了几个高音喇叭。我们齐唱《东方红》。工宣队代表、军宣队代表和居民代表轮流发言，然后街道革委会领导讲话。大家不断振臂：“毛主席万岁！共产党万岁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！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然后文艺表演：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《北京的金山上》《白毛女》《红灯记》，配乐词朗诵“土豆烧熟了，再加牛肉。不许放屁”……大会结束，我们高唱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，听着雄壮的《国际歌》，回到没有厕所和自来水的瓦房。

大概一九八〇年，我上高中时，院里终于有了自来水。每家一个水龙头，一个水表，一个内里铺了瓷砖的小水池，但是都在室外。明婆婆的水桩，只有还没接上自来水管的居民才去光顾。不知为什么，街上和对面大杂院的井水渐渐浑了枯了。街口公厕重新修过，装了统一冲水的自动水箱，但是依然很臭。厕所开始收费（去厕所倒桶子不用给钱）。一个乡下人白天坐在厕所门口，喝茶、做饭、吃饭、抽烟、聊天、听广播，顺带用肮脏拖把打扫一下厕所。为了省钱，我们都买一版一版的厕所票。祖母很细心，用剪刀把质地粗糙的厕所票一张一张剪得好撕。土坦克还在进城，每天黄昏我们还倒桶子。有年春天，院里那棵老桑树不发新叶了。在这之前，明家种的葡萄树已有好几年不结葡萄。葡萄架很快变成金银花架，花台旁摆着陈伯伯的大小金鱼缸和兰草盆栽菊花盆栽。陈伯伯打老婆和三个女儿很凶，每次让你觉得就要把人打死，但是陈伯伯爱惜花草和金鱼。

二〇一四年二月八日

上学

一

我没上过幼儿园，也没念过小学一年级。该上小学那阵，父亲把我带到呼和浩特住了十个月，我大概那时开始识字。我忘了最初认得哪些字，应该不是“毛主席万岁”，但也不是唐诗。回到成都，上池北街十九号的邻居又成了我的启蒙老师。跟着大人上街，我喜欢大声读出商店招牌或墙上门板上的“最高指示”；他们也喜欢考我教我，夸我认得不少字。我记得的第一首歌谣也不是“东方红，太阳升”，而是祖母念的一段顺口溜，没有旋律，只有手势，两手交叉，十指变幻，看得让你眼花缭乱：

王婆婆，在卖茶，
两个观音来吃茶。
后花园，两匹马，
两个僮儿打一打。

王婆婆，骂一骂，
隔壁子么馆儿说闲话。

祖母姓王，我以为这个王婆婆就是我的祖母。后来，听院子和街上的婆婆大娘也这么念，我才晓得卖茶的王婆婆跟我祖母没关系；也许本地所有祖母，还有祖母的祖母都是这么念的。

另一段顺口溜也逗小孩子，我只记得开头几句：“扯锯，还锯，家婆门口有本戏。请外孙，来看戏……”大人一边念，一边来回晃着怀里或膝上的小孩子。“包袱”在结尾，大意是，看完戏没吃的，只好请你吃“牛肉包子夹狗屁”（念到最后，声线抬高，有点促狭）。听到这里，小孩子往往跟着大人咯咯傻笑，虽然不知道“牛肉包子夹狗屁”是什么东西。

但我见过幼儿园。隔壁易嬢嬢当保管前，是省邮电管理局机关幼儿园的老师，单位上的人都叫她易老师。我跟着易老师去过几次幼儿园，她的同事常常把我当成她的小儿子。我那时跟幼儿园的大班儿童差不多年纪。我看到装了高栏杆的一排排木床，走廊，木马，滑板，一叠叠小人书。除了小人书诱惑，我不是很向往幼儿园。就像我不喜欢住在过街楼街的母亲家，害怕看到戴着口罩扫街的管制分子外婆，只有回到祖母那里，回到上池北街十九号，我才觉得自在和安全。

我的父母还没离婚。我不可能老是住在祖母那里，更不可能不进学校。母亲找到她的妹妹。五嬢在东郊一家纺织厂子弟校教书，她的一个熟人在市内的西马棚街小学当教务主任。我直接上了小学二年级。我还记得跟着五嬢和母亲站在西马棚街小学的操场上，她们跟教务主任夸着这个小男孩，说他聪明，认得不少

字，算术也没问题，完全跟得上进度（母亲数学很好，给我补了不少课）。

学校距母亲家很近，我只得跟母亲住。她在城边街的街道锻压生产组上班，白天回不了家，常常给我几分钱或几毛钱，让我中午买个锅魁^①或吃碗面。几乎每个星期六中午，我都盼着放学，走回上池北街的祖母家，想着可口饭菜和院内邻居。挨着祖母，我在她的大床睡一晚上。星期天黄昏，祖母和易嬢嬢把我送到过街楼街母亲住的大杂院门口。又是一个星期的煎熬。

我在西马棚街小学只念了一个学期。我应该跟得上二年级的进度，但是记忆太模糊。我还不是红小兵。跟我同桌，或者坐我前面的，是个名叫席刚的胖男生；这个姓很特别，比初恋还让人难忘。冬天，席刚戴了一双厚厚的军用棉手套。他的手指长了冻疮，肿得就像发亮的红萝卜。

那个学期，学校组织学生看了一部朝鲜电影《永生的战士》。男主人公是抵抗日本殖民者的民族英雄。电影最后，他在狱中视死如归。担心自己受不了酷刑而出卖同志，他咬断自己的舌头。风雪满天，没了舌头的革命英雄拖着脚镣英勇就义。画面切到过街楼街，我父亲从内蒙回来。他在医药公司做药材收购，全国到处跑。不知哪次探亲，我父亲跟我母亲一不小心，生出我的妹妹。等我妹妹大概一岁，有个星期六中午，祖母和父亲站在学校门外接我回家，当然不是回过街楼街。我父母终于散伙了。

① 锅魁，略等于北方话中的烧饼。